

短篇小说集



李 瑞

北方的故事

李 瑞

北方的故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方的故事
BEIFANGDEGWISHI

李瑞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字数:183千 插页:2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80册

统一书号:10089·395 每册:1.20元

目 录

良心·····	1
北方的故事·····	21
潮流·····	35
并非虚构的故事·····	60
鹰飞岭·····	72
校园笔记·····	80
前面是急转弯·····	95
布林河畔的篝火·····	142
红双喜奶糖·····	191

良 心

这是个暮冬的周末的晚上，天冷极了，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都去观看文艺节目了，趁此机会，我一个人走出宾馆，踏着松软的积雪，去探望多时不见的艺校老校长苏子民。

老校长早已经退休，他的双腿由于在文化革命期间落下了残疾，已经瘫痪了。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坐在一辆专为残疾人定制的双轮手推车里，见到我非常高兴，不住地搓着手，连忙吩咐老伴为我沏茶，拿烟。

屋里温暖如春，我们寒暄过后，便呷着浓茶，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

虽然老校长身体残废，年岁又大，显得苍老多了，但是精神矍铄，仍和当年一样健谈。我们的话题，从探讨艺术规律，谈到双百方针，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谈到文艺的现状，最后，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各自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遭遇。

说起来，我们这些文艺界的“老人”，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哪个人没有一段劫后余生的“患难史”，我见过不少人，只要一提起自己这段“患难史”，就禁不住悲愤交加，老泪纵横。但从来没听见苏校长讲过自己的遭遇，我早就听说，在那时，苏校长吃了不少苦，直到搞得下肢瘫痪，几乎送了老

命，就叫他讲讲这段遭遇。

苏校长挥了挥手，淡淡一笑：“我的遭遇平平常常，没啥可讲的，受苦也不多，比其他同志差远了。再说，事情早过去了，提它干啥！”

“不，你一定得讲讲，听说在咱们这班老人当中，你受苦不轻啊！可你从来没对人讲过。”我再三要求，苏校长只是笑着摇头，最后，终于经不住我的请求，他说：“好吧，你非听不可，我就讲讲，其实，在那些日子里，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笑容在他脸上消失了，他若有所思的沉默了一会儿，好象在梳理自己的思绪，然后，用缓慢的，深沉的声音讲了起来——

说起来，这是整整十年前的事了，那是一九六九年旧历除夕晚上，天下着雪，刮着西北风，窗外寒冷而漆黑，除了零零落落的鞭炮声使人想到这是中国传统节日的夜晚外，外边没有一丝欢乐的景象。吃完晚饭，我就坐着那张扶手椅上发呆。一种百无聊赖。万念俱灰的感觉使我的心情烦躁而压抑，胸口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那种心情不用多说，你们会完全想象得出来的。那时候，正是咱们这里挖“新内人党”挖得最凶的时候，每天你都能看到疯狂，看到残暴，看到血！每天你都能听到诬蔑，听到陷害，听到欺骗，最可怕的是千百万善良人在这种革命口号掩盖下的暴行面前象羔羊一样束手无策，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大假案、大错案酿成灾难。早上，你战战兢兢地去上班，也许晚上就再也回不到家了。我们学校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挖”出来，我身边的几位蒙族老师都已经被关押起来，其中，我们大家都敬重的巴特尔老师已经含冤死在毒刑拷打之下……。

我那时候是个幸存者，虽然，文化革命初期我被扣上了“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等各种帽子，但是后来我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每天劳动，立功赎罪。在挖新内党中，我因为是解放后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无论和少数民族干部还是和草地上的蒙族同志都没什么来往，所以，专案组虽然把我叫去“敲打”过两次，但是，我还是侥幸地逃脱了被挖出来的命运。你们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过春节，我的心里哪能有一点欢乐。

我就在那张椅子呆呆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响起了“笃笃笃”的敲门声。我一惊：这么晚了，谁还能来呢？再说，自从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这里就很少有人来作客了。我老伴已经有了一种毛病，一听见敲门声就无缘无故地哆嗦。她有些惊慌地望着我，说不出话来。我站了起来，走去开了门，出乎我意料之外，门外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长过膝盖的老羊皮袄，脚上是一双只有草地上的牧民和农村的赶车人才穿的毡靴子，他的脸膛又黑又瘦，两只不大却挺机灵的眼睛闪着胆怯的惶惑的光芒，一绺湿淋淋的额发贴在脑门上，冻得青紫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牙齿。他身上落满了雪，显然是走了很远的路，他的双手揣在袄袖里，贴胸抱着一个乐器盒子，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一把马头琴。

“你找谁，孩子？”我惊奇地问。

“这是苏校长的家吗？”那孩子操着一口非常生硬的汉语，他小心地看了看周围，压低了声音说：“我从草地上来，从达尔罕草地上来的。”

“草地？难道你找我吗？”我更奇怪了。我在草原上既无亲戚，又无朋友，怎么会是找我呢？

那孩子肯定地点了点头，胆怯地望着我。

“那么，你进来吧。”我看他冻得好象在发抖，就把他拉到屋里。

他先在台阶上仔细地擦了擦脚，进了屋，把琴盒小心翼翼地放在墙角，然后，坐在椅子上使劲地脱去一只毡靴，从鞋垫下边取出一张潮湿得发了黄的小纸条递给我。

我当时是那样慌乱，简直不知怎么办好，这一切太突然了，在挖内人党那个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候，每天都听见说内人党是什么“单线联系”啦，“采取特殊联络方式”啦，搞得那么神秘和恐怖，当这个自称从草地上来的不速之客把那纸条递给我的一瞬间，我立即警觉地想到：圈套！这是有人要把我打成新内人党设下的圈套。我象烫着手似的急忙缩回手说道：“不，不，你一定是找错人了，我在达尔罕草地不认识任何人；请你走吧。”

那孩子还要说什么，但我态度越发坚决：“不，请你走！”我老伴哆嗦着跑去给他开了门。

一种近乎绝望的神情罩在那孩子的脸上，他胆怯而惶惑地望了我一眼，低下头去，然后，慢慢转过身，走向墙角，小心地抱起他的琴，向开着的门走去，就在他要出门的时候，象是重新下了决心似的，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校长，您不要疑心我，我确是从达尔罕来的，达尔罕草地的札木苏老人是我的爷爷，他让我来找您……。”

我愣住了。札木苏老人？难道就是那个誉满达尔罕草原的老琴手札木苏？

三年前，我带领学生们到达尔罕草原去采风，曾在达尔罕湖畔的蒙古包里，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在熊熊的篝火旁，好客的主人乘着酒兴，为我们演奏了马头琴。我敢说，那

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优美，这样动听，这样奇异的琴声。

那琴声，深深地打动了。倒不是因为琴手有着多么娴熟的技巧，也不是因为他一晚上拉了数也数不清的变幻无穷的曲调。我被感动，是因为我这个搞了半辈子音乐的人在那琴声里感受到了一种深沉的、淳朴的、非常新鲜的东西。那是真正的艺术，是扎根于沃土中的质朴无华的艺术之花，是一个古老民族世代相传的才华和智慧的惊人表现。它居然能够把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欢欣，那么深沉又那么蕴藉地融汇在一曲曲优美的琴声中，它那丰富的表现力是多么叫人吃惊啊！

听完这一曲曲琴声，我立即拉住了拉琴的牧人，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的曲子整理出来。这牧人就是札木苏，就是全达尔罕草原闻名的老琴手。当时，他已经有了七分醉意，脸膛紫红紫红的，拉住我的手笑了起来：“苏校长，我早就知道你，我听过你整理和创作的曲子，你是真正懂得草原和蒙古民族的音乐家。”

“啊，札木苏老人，我早就听说过你，还是百闻不如一见，真想不到，在达尔罕草地上能听见你这么多美妙的曲子，还是纯粹的科尔沁演奏法哩！”

札木苏又惊又喜，爽朗地大笑：“还是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科尔沁是我的家乡，我是二十年前从那来到达尔罕的。”

老札木苏和我一见如故，那一晚，在篝火旁，我们开怀畅饮，彻夜长谈。我们谈到了传统曲调的挖掘整理，谈到马头琴的改革，越谈越兴奋，越谈话越多，一直谈到了启明星的微光在天边闪烁，仍然谈兴未尽，我们商量好了，第二天天一亮，札木苏老人就带领我们到阿合古勒盛山里去采风。

可惜，第二天，当我们喝完奶茶正要上路的时候，送来了学校的加急电报，叫我带领学生立即返校，运动已经开始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机会见到札木苏老人了，可是眼前这个孩子……难道他真是札木苏老人的孙子？但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心头，使我的胸口咯咯地急跳起来，我一把拉过那孩子，问道：“那你爷爷呢？他现在在哪？”

孩子呆呆地望着我，慢慢低下了头，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可怕的预感证实了，我的心痛苦地紧缩了。

“爷爷……他……死了……”孩子抽抽答答地说：“他们说爷爷是内人党的头子，逼他交待内人党的名单……爷爷不写，他们就，他们就打他，拿皮鞭子蘸凉水……拿火烤……拿针，还拿……。爷爷死前，我见了他，他说：孩子，你再没亲人了，去吧，去找苏子民校长去，他……他一定收留你……。”

我急忙打开孩子给我的那张纸条，几行模糊、潦草的字迹映入眼帘：

苏校长：

请您相信一个蒙族老艺人的正直清白吧。

请您收留和保护这孩子，他是我十二年前在达尔罕收养的孤儿，他已经再没亲人了，这孩子跟我学过五年琴，他是我们民族的后代，这孩子的音乐天赋……

还没看完，泪水就糊住了我的眼睛。我仿佛看见受人尊敬的老艺人札木苏在毒刑拷打下遍体鳞伤，但却高昂着那颗白发苍苍的头。我一把拉过那孩子，抚摸着他瘦削可怜的肩膀，久久地注视着他那又黑又瘦的脸膛。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布里古德。”

“啊，好，鹰！那么你怎么从达尔罕来的呢？”

“我走来的，我走了八天。我不敢坐车，怕他们抓住我……。”

我惊呆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凭着什么的毅力和信念，才能在风雪弥漫的达尔罕草原上跋涉八个昼夜，找到这里。

我急忙叫老伴给他热饭热菜，为了给他驱寒气，还特地冲了一碗红糖姜水。

孩子饿坏了，他埋着头狼吞虎咽地吃着，我们都不说话，爱怜地看着他吃。直到他把最后一块馒头擦净了盘子里的菜汤塞进嘴里，疲乏地把头靠在椅子背上，瘦瘦的黑脸膛上才泛起了红晕。

夜已经深了，雪越下越大，窗外的鞭炮声更加寥落了。我叫老伴把房门锁好，挂好窗帘，又在窗帘上加挂了一条毯子，然后，对布里古德说：“孩子，你拉一段琴给我们听听吧，小声点，不怕，没人听见的。”

孩子小心翼翼地取出琴，象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似的，用粗糙的、满是裂纹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然后，眯起眼睛望着被毯子遮得严严实实的窗户，仿佛望着一个谁也望不见的遥远遥远的地方，轻轻地、轻轻地拉了起来……。一串串看不见的音符，从颤抖着的琴弦和跳动着的琴弓上流泻出来。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哦，我已经多久没听见真正的音乐了。这琴声多么美妙神奇！这就是从那个雕刻精细的琴箱里发出的声音吗？不，这是达尔罕大地的声音！这是发自大草原那广袤的母亲般的胸膛深处的声音！这声音呵，时而

轻盈欢畅，象一泓潺潺的溪水流进我那象沙漠般干渴的心中，时而又悠扬轻柔，象是一只温暖的手掌抚摸着我这颗长了老茧的心；这琴声时而凄婉苍凉，那是达尔罕湖畔的苦艾和芎苢草在晨风中絮语；这琴声时而浑厚粗犷，仿佛阿合古勒盛山中的林涛在群峰中回荡……。

琴声停了。

我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只留下那挂着厚厚的毛毯的窗户。我由陶醉变为激动，由激动变为惊异。是的，我这个搞了多半辈子音乐的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识别出任何一个具有音乐天赋的人，但眼前这个孩子还是叫我吃了一惊。不错，用一个真正好琴手的要求，他还缺乏变换自如的技巧，在力度对比上，音色变化上和指法弓法上都有欠缺，但他最突出的长处除了有精确的音耳外，就是对自己要表现的东西有着惊人的理解力。当他对着你拉琴的时候，你会感到，他不是用手在拉，而是用整个纯洁的身心 and 全部真挚的感情，向你倾述他心中最美好最动人的东西。这是一块朴素的璞玉，一经雕琢，一定会放出奇光异彩。

我被感动了，情不自禁地把孩子拉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孩子，谢谢你，你使我又看到了达尔罕草原。”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的额头滚烫，他在发烧，我急忙叫老伴找药，倒开水，亲自叫孩子把药吃下去，然后，把我大女儿参军前住的床铺收拾出来，安顿孩子躺下。他很快就睡熟了。

我在孩子的床前坐了很久，当我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才发现老伴满脸忧心忡忡的神色，不安地问我：“你打算收留这个孩子么？”

“是的，这孩子再也没亲人了。我们不收留他，叫他怎么办呢？他是老艺人札木苏……”

“可是我们连自己都朝不保夕啊！这些天我老是担惊受怕，怕他们把你打成内人党分子，那些人象狗似的在咱们家嗅来嗅去，发现一点嫌疑也不会饶过咱们，再加上你这个反动权威的身份……。你知道，我……我神经衰弱得一整夜睡不着觉，我再也经不起大事了……”

我安慰着老伴：“你们不要怕，他们没一点证据，能把我怎么样？”

“证据？你怎么还这么傻？他们抓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人，哪一个有证据？这孩子是札木苏的孙子，札木苏是内人党的头子，现在孩子住在咱们家，只要他们知道了这一点，你就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我担心你这个身体，你这个年龄，万一抓进去，再想活着出来……”老伴忍不住抽噎起来。

我知道老伴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也知道事情确实是严重的。我踱到窗前，沉思起来。

老伴见我不说话，走过来拉住我胳膊，急急地说：“子民，我跟你过了快一辈子了，你就听我一次话吧，就这一次。明早天一亮，我们给孩子拿上钱，拿上粮票，带足衣服，送他走吧，他肯定还有亲戚朋友家。……你别这么看着我，咱们是实在没法子啊，我也知道，收留这孩子是很高尚的举动，但我们的处境……将来，任何人也不会责备我们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良心不责备自己的话，任何人的责备还有什么用呢？”我突然激动起来：“如果这孩子是来咱们家作客，你把他赶出去我也不管。可现在，他走投无路，举目无亲。老艺人札木苏临死前把全部希望和信赖都寄托在苏子民身上，这有多大的份量啊！可苏子民呢？是个胆小鬼，是个自私自利的儒夫，你想想看……不！如果我不收留这孩子，这将是我一生的耻辱，即使我活着，我也再看不起我自己了。我这个

老共产党员将来怎么在学生面前抬起我这个满是白发的头，给他们讲什么艺术家的勇气和良心……”

老伴捂住脸，哭了起来：“我也知道你对，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呀！他们要抓走你，这孩子也跑不了。再说，现在你每月就发三十元生活费，咱们怎么养活他呢？孩子没户口，粮食也没有。”

我装出轻松的样子，极力安慰老伴：“三十元钱，三口人，也勉强够了，从明天起，我就戒烟。我每天那半斤牛奶不要订了，我最不爱喝那东西，一股膻气味儿，也没什么营养，我多锻炼锻炼……”说着，我使劲拍了拍瘦骨嶙嶙的胸脯，想逗她发笑。

这时，里屋孩子突然惊叫起来，我急忙奔过去，拉开灯，只见孩子从床上跳起来，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惊恐地望着我，好半天，才喘着粗气说：“我做了个恶梦，梦见他们抓我……打我……”

“别怕，孩子。”我抚摸着他汗津津的额头，给他盖好被：“睡吧，在这你什么都不用怕。”

一直到孩子睡熟，我还在床边坐了很久。说实在话，我有些发愁，如何收留和保护这孩子，又不叫外人知道呢？怎样在这困难条件下帮助他练琴，使他的音乐天赋得以充分发挥……。一整夜，我翻来复去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叫老伴翻箱倒柜，把我二儿子从前穿的旧衣服找了出来，给孩子换上。并且一再嘱咐他不准出头露面，万一有人见到他，就说是我的一个外甥，好在那时候也没什么人到我这个反动权威家去作客。安顿妥当后，我就急忙去上班。

上班以后，我才知道我的想法多么不合实际，因为形势已

经急剧变化，全市已经开始了所谓围歼新内人党分子的大会战，各个单位都象竞赛似的比着谁挖出来的内人党分子多，到处是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喧嚣声，满街是游街的人群，一连几天，单位里开“宽严大会”，宣布释放了揭发出七十九名内人党分子的原党委秘书刘长路，当场逮捕了原党委副书记陆枫，并且第二天下午就宣布陆枫顽固不化，自绝于人民，已经“畏罪自杀”，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们几个幸存者也岌岌可危，专案组已经每天叫我们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而且，杀机毕露地警告说：如果不老实交待，只能象陆枫那样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我预感到要祸事临头，越发担心那孩子，这天下班后，我急急忙忙赶回家，一推门，只见老伴眼睛红肿，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孩子却不见了。

“孩子呢？”我忙问。

老伴用衣襟擦着眼睛，说不出话。

“孩子呢？”我连声音都颤抖了。

“孩子，他走了，他说要到别处去躲躲，我给他拿了钱，带上衣服……”老伴结结巴巴地说。

“你把他打发走了？”我气得吼叫起来：“你，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老伴被我的神色吓坏了，语无伦次地说：“不，不是，我是怕出事，上午，群众专政指挥部来人，说家里生人不报户口不行，还说……”

“别说了！”我粗暴地打断她，用手指着她：“要是那孩子出了事，我一辈子都不原谅你，不原谅！”说完，就象发了疯似的，连帽子也没戴，就奔到大街上。

我无目标地到处寻找，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市区。直到半

夜，才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找到他。

孩子蜷着身子，抱着那把琴，躺在候车室那冰凉的大长椅子上。他看见我，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站了起来。我拉着他的手说：“孩子，跟我回家，你叫我找得好苦。”

他摇摇头，用他那黑漆般的眸子注视着我，象个大人似的凄然一笑：“我不回去了，我不能给你们找麻烦……”

“别这么说，孩子，你大娘上了年纪，她是个病人，她吓怕了，咱们得体谅病人，走吧，回家吧。”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怕连累你们……”说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把孩子领回家，安顿他睡了觉，一句话也没跟老伴说，就躺在床上。直到我迷迷糊糊睡醒一觉，发现灯还亮着，才看见老伴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着孩子撕破的棉裤。看见这情景，我忽然对跟我尝尽艰辛的老伴产生了一股说不出的怜爱和心酸的感情，但我知道，我只能这样做。我扪心自问：收留和保护这个孩子仅仅是由于一个音乐教授对一个艺术天才的偏爱吗？不，远不止这样。自从那个除夕之夜，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时时都在提醒着我，这孩子是这个民族的后代，他已经充分显示出了惊人的音乐天赋，但是他前面还有着多么艰难曲折的路啊！当他刚刚睁开天真纯洁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就看见了疯狂，看见了血，看见了美丽词藻掩盖下的暴行，看到了强权下的欺骗和出卖，我们社会中阴沟里的脏东西不幸都叫他看见了，这是个受了创伤的小心灵。这样的创伤是可怕的，它不仅能毁掉一个早熟的有天赋的孩子，而且能毁掉一个人心目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当他处在举目无亲的绝境中，拿着爷爷临死前写的信找来的时候，他是把全部希望和信赖都寄托在我这个艺术老前辈的身上。一丝一毫的怯懦都会使这个

孩子受到致命的伤害，使他产生一种对艺术，对人生，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绝望的、憎恶的心理，可能终生和音乐分身，甚至变成一个看破一切，玩世不恭的颓废者。这多可怕啊！不，他应该看到正义，看到真理，应该感受到温暖和友情，应该看到我们社会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

我从床上跳起来，激动地走到老伴身旁，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她。我拉住她那瘦得只剩一层皮的手，说：“淑贤，你别怪我，你听我说……”

她用手摀止住了我：“不，别说了，我都明白。”两颗大大的泪珠从老花镜下流下来。

“淑贤，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人，你忘了，三十年前，你送我去延安，独自担起这个家的担子，你那时是多么坚强！”

“我也不知为了什么，我大概是吓怕了，我总预感着要有什么祸事临头，这两年，我总象是生活在一场恶梦中，好象人们都疯狂了。我们都是普通人，既不能扭转乾坤，也不能叱咤风云，只求厄运不要降临，能平平安安过去，我们何苦要干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呢？”

“不，你错了，淑贤。我们确实是些普通人，甚至是些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我们也做不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我们拼着性命保护这个孩子这件事也不会记在什么历史上，也许将来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但我们自己呢？多少年后，如果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老伴望着我，一句话也没说，她默默地把一封信拿给了我。这是我们参军的大女儿来的。信中说，她所在的部队文工团已经决定要解散了，大部分人都转业到地方，只挑选十名水